

《四库全书总目》与古籍辨伪^{*}

李建清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摘要:受辨伪学发展影响,四库馆臣十分注重古籍辨伪。《四库全书总目》考辨古籍真伪共包括书籍作者、成书年代和文字章节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考证作者是否真实,成书年代是否确切,古籍内容前后是否一致。他们的观点成为后来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为后来的古籍鉴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辨伪;版本

中图分类号:Z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19)11-0067-05

古籍辨伪始于先秦,汉刘向奉命校书,撰写《别录》,其中就已经包括相关内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以小注形式,用按语说明古籍造伪的原因和托伪的简单过程。唐中期,独立思考、质疑辨伪的风气更为普遍,柳宗元辨疑群书,特别是诸子著作的辨伪,成就突出。宋代疑古风气更浓,不管新学还是旧学,不管义理学派抑或考据学派,没有不涉及辨伪的,其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目录学名著也将辨伪当作重要组成部分。时至明代,古籍真伪研究出现了两位大家——宋濂和胡应麟。胡氏总结发展前代辨伪的成果和经验,写成专著《四部正讹》,他在书中对伪书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第一次提出伪书的特征以及考核伪书方法等理论问题。清代,随着考据学的深入发展,古籍辨伪有了进一步提高,比较著名的辨伪成果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等。编成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受辨伪学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注意古籍真伪的考辨,其辨伪之基本思想与原则彰显于凡例第十八则:

《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膺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膺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其踵误传讹,如,吕本中《春秋传》,旧本称吕祖谦之类,其例亦同。至于其书虽历代著录而实一无可取,如《燕丹子》、陶潜《圣贤群辅录》之类,经圣鉴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不使滥登。^{[1]19}

透过这则凡例,我们可以概括出《总目》辨伪共包括书籍作者、成书年代和古籍内容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考证作者是否真实,成书年代是否确切,古籍内容前后是否一致,以此鉴别古籍的真伪。其对待伪书的原则是慎重取舍,主张分类处理:对前代已经确定为伪书,但又是有价值的,仍然著录;对那些毫无可取的,则付之存目。而无论著录,抑或存目,都必须“一一详核”“辨证其非”,这也是《总目》辨伪所用到的基本方法和慎重态度。

一、古籍作者

作者的辨别,是探寻古籍来源的重要步骤,也是辨伪的重要工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流传至今的古

^{*} 收稿日期:2019-08-20

基金项目:2017年度浙江省社科规划后期资助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提要汇校与研究”(17HQZZ17);2013年浙江省社科联项目“《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提要整理与研究”(2013N056);“对外汉字教学策略与方法研究”(JGB13021)。

作者简介:李建清,讲师,博士,从事目录学、文字训诂学研究。

籍也存在不少因作者伪误而形成的伪书,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复杂多样:有书籍由后人逐渐增加而成,从而作者不明;故意作伪,托名他人,从而作者不清;书籍辗转流传,抄刻失误,从而作者不正确等等。《总目》采用多种方式考辨古籍作者真伪,从而寻求古籍的真实来源。

(一)利用序言、附记

古籍序跋、后记大都有写作缘由、作者生平和本源流等情况的翔实记载,是考辨著者真伪的重要依据,《总目》善于抓住这些线索,例如《类篇》提要:

旧本题“司马光撰”。嘉定癸亥董南一作光《切韵指掌图序》,亦称“光尝被命修纂《类篇》,古文奇字,搜猎殆尽”,然书后有《附记》曰“宝元三年十一月,翰林院学士丁度等奏:‘今修《集韵》,添字既多,与顾野王《玉篇》不相参协,欲乞委修韵官,将新韵添入,别为《类篇》,与《集韵》相副施行。’时修韵官独有史馆检讨王洙在任,诏洙修纂。久之,洙卒。嘉佑二年九月,以翰林学士胡宿代之。三年四月,宿奏乞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大理寺丞张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迁枢密副使,又以翰林学士范镇代之。治平三年二月,范镇出镇陈州,又以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代之。时已成书,缮写未毕。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则光于是书特缮写奏进而已,传为光修,非其实也。^{[2]349}

四库馆臣用《附记》驳斥了董南一的观点,认为司马光仅仅进行“缮写”“进奏”之事,并不是《类篇》的作者。据《附记》,《类篇》是由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相继修纂,最后由司马光最后缮写、奏进的。当然,治平三年(1066)二月至四年(1067)十二月这么长的时间司马光仅将“缮写未毕”之事做完,未免不合实际,另外,《类篇》中也有其说明体例、纠正谬误等方面的案语。因此也应该看到司马光的审定之功,如果没有他最后修订,就很难见到这部辞书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字书了。

《总目》有时会间接利用相关序言来考察古籍作者的真实情况,例如《集韵》提要就依据《切韵指掌图》自序“仁宗皇帝诏翰林学士丁公度、李公淑增崇韵学,自许叔重而降,凡数十家,总为《集韵》,而以贾公昌朝、王公洙为之属。治平四年,余得旨继纂其职,书成上之,有诏颁焉。尝因讨论之暇,科别清浊为二十图”,^{[3]359}考证《集韵》成书时间是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其书“成于司马光之手,非尽出丁度等也”。^{[3]359}

(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

《总目》能充分利用前人考据成果和相关记载来考定真实作者。例如《崔氏小尔雅》提要在考证著者时就曾引用闵元衢《欧余漫录》,曰“《小尔雅》,汉孔鲋撰。汝郡袁氏《金声玉振集》误为崔仲龟著,收入撰述部。以汉为本朝,以崔易孔,岂其不详考耶?抑以世可欺也”。^{[4]370}四库馆臣认为《崔氏小尔雅》就是《小尔雅》,崔铤乃是伪题之姓名,其辨伪工作包括两个方面:内容比对;直接利用闵元衢《欧余漫录》中考据成果。

考辨作者真伪有时也可以将与著作、作者相关的记载作为可资利用的材料,例如《正字通》提要,其主要依据两则材料,一是专门记述明末清初杂事的笔记《觚剩·粤觚下篇》,一是以谈江西人事为主的杂家类著作《妙贯堂余谈》。利用这两部著作中都有关于《正字通》作者的记载,考实作者为张自烈,而西南康府知府廖文英以某些条件作交换,取得了张自烈《正字通》印行权和署名权,从而解决了一桩著作权公案。

(三)参考著者身份

《总目》考察书籍内容、体例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的品位、价值,以及其与书籍题写作者,或修订者的名望是否相符,如果两者完全不匹配,就说明原书所题写作者是伪托。例如《篇海类编》提要:

旧本题“明宋濂撰,屠隆订正”,……其书取韩道昭《五音篇海》以部首之字分类编次,舛漏万状。无论宋濂本无此书,即以所引之书而论,如田汝耘、都俞、李登、汤显祖、赵铭、章黼、杨时乔、刘孔当、赵宦光,皆明正德至万历时人,濂何从见之?至于以赵搢谦列林罕、李阳冰间。既有一“郑樵”,注曰“著《六书略》”,又有一“郑渔”,注曰“字仲明,夹漈人”。他如以《玉篇》为陈新作,以《韵会笺》为黄绍作,以高似孙为高衍孙,以《洪武正韵》为毛晃作,以《古文字号》为马融作、郑元注,以《五声韵》为张有作,以《别字》十三篇为孙强作,以《六书精蕴》为孙恂作,殆于醉梦颠倒,病狂谵语。屠隆虽不甚读书,亦不至于此,殆谬妄坊贾所托名也。^{[5]372}

四库馆臣用事实说明《篇海类编》存在严重问题,作者生活时代与其记述内容不一致,存在大量常识性错误,可以说是漏洞百出,黑白颠倒。很明显,质量这么低劣的著作不可能出于宋濂、屠隆之手,他们的名字被冒用了。明代大家被冒名的还有汤显祖,例如《五侯鲭字海》提要认为该书注释简略、体例芜杂、注音讹谬,其中《四书五经难字》更是浅薄,这么粗糙的著作与其订正者汤显祖的身份、地位是不相称的,由此确

定“显祖犹当日胜流,何至于此?盖明末坊贾所依托也”。^{[6]76}依托当时的有名望、有地位的名人有利于商人刻印书籍的传播和销量,这是著者作伪常用手段。汤显祖作为明代杰出的剧作家、文学家,除了被署名订正《五侯鯖字海》外,还被署名参编《海篇统汇》。

二、成书年代

古籍作者考辨清楚了,成书年代也就自然解决了,但是如果古籍的作者被推翻否定,而真正的作者一时又无法考知,或者已经证实而各自说法迥异,那么,根据其他相关的资料及这部书的内容来探求其成书时间,或者相近的时代,就成为迫切的任务了。《总目》考定古籍具体成书时间,大致可以分以下两种情形:

(一)立足本书内容

古籍是由文字词汇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古籍本身的文字、思想和名物就像血肉、灵魂,不可或缺,而又接受时代的浸染。四库馆臣善于抓住古籍本身富有特色的线索,如训诂类著作的词义解释,文字类著作的收字和编排体例,音韵类著作的韵目数量和排列等,抓住其中任何一点特征,深入分析,就能帮助找寻到成书时代的证据。如《小尔雅》提要:

案《汉书·艺文志》有“《小尔雅》一篇”,无撰人名氏。《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载“李轨注《小尔雅》,一卷”,其书久佚。今所传本,则《孔丛子》第十一篇抄出别行者也。分《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十章,而益以《度》、《量》、《衡》,为十三章,颇可以资考据。然亦时有舛迳,如《广量》云“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本诸《春秋传》“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文;下云“釜二有半谓之簋”,与《仪礼》“十六斗曰簋”合;其下又云“簋二有半谓之缶,缶二谓之钟”,则实八斛,乃《春秋传》所谓陈氏新量,非齐旧量“六斛四斗”之锺,是豆、釜、区用旧量,钟则用新量也。《广衡》曰“两有半曰捷,倍捷曰举,倍举曰铢”,《公羊传疏》引贾逵称“俗儒以铢重六两”者,盖即指此。使汉代小学遗书果有此语,逵必不以俗儒目之矣。他如谓“鹄中者谓之正”,则并正鹄之名不辨。谓“四尺谓之仞”,则《考工记》“浚深二仞”与“浚深八尺”无异矣。汉儒说经,皆不援及,迨杜预注《左传》始稍见征引,明是书汉末晚出,至晋始行,非《汉志》所称之旧本。晁公武《读书志》以为孔子古文,殆循名而失之。^{[7]370}

《小尔雅》是以训释先秦典籍词义为主的训诂专书,具有很高的训诂价值与文献价值,在语言学史与辞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由于此书来历不明,学术界对其真伪,特别是作者、成书时代及其与《孔丛子》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四库馆臣认为,《小尔雅》古本亡佚,今本是伪书。其围绕《小尔雅》词义训释而展开的辨伪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从来源看,《孔丛子》既出伪托,其《小尔雅》也一定不会是《汉志》原书,故只存其目,而不复录其文。其二是从词义训释看,《小尔雅》有些词语的释义显然直接抄录他书,有些释义采用两套标准而互相矛盾,有些释义不准确而与经传注释不一致,这都与汉代小学遗书的那种训释要求准确可靠,态度要求严肃认真的传统不同。另外,《小尔雅》释义时,还引用了贾逵的“俗儒以铢重六两”,《总目》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小尔雅》不是俗儒所作,接着否定了今本《小尔雅》。其三是从征引情况看,汉代人说经没有引用《小尔雅》,其始见征引于晋《左传集解》,由此判断其成书时间在汉末之后。根据训诂专书的特点,从具体的词义训释中寻找证据,考辨作者,确定成书时间和判断书籍真伪,这样的思路和方法在《总目》各部类古籍辨伪中还有很多运用。

(二)凭借相关资料

古籍产生的历史遥远,于成书年代和作者又无明确记载,这给考辨其真伪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会被不同书籍收录、记载,会被不同时代的人介绍、注释,会有一些人对其进行考证,时间长了,总会留下关于判定其真伪的很多资料。《总目》在确定古籍成书年代时就注意收集和利用这类相关资料,以考辨《尔雅》真伪为例。《尔雅》是一部古代经典的词语解释之书,为十三经之一。由于成书较早,最早著录《尔雅》的《汉书·艺文志》也没有指出其编撰者和成书年代,后人对此历来众说纷纭。四库馆臣在《尔雅注疏》提要中专门辟出一块空间来讨论,于《尔雅》的作者,首先引用《大戴礼·孔子三朝记》、《进广雅表》两段材料,以罗列关于《尔雅》作者的各种观点,但各方观点“于作书之人,亦无确指”。在无明确文献记载的情况下,四库馆臣要探究其作者,必先考求其成书之年代。例如:

郭璞《尔雅注序》称“豹鼠既辨,其业亦显”,邢昺《疏》以为汉武帝时终军事,《七录》载犍为文学《尔雅注》三卷案:《七录》久佚,此据《隋志》所称梁有某书亡,知为《七录》所载。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汉武帝时人,则其书在武帝以前。曹粹中《放斋诗说》曰按:此书今未见传本,此据《永乐大典》所引。《“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如‘学有緝熙于光明’,毛公云:‘光,广也。’康成则以为‘学于有光明者’,而《尔雅》曰:‘緝熙,光明也。’又‘齐子豈弟’,康成以为‘犹发夕也’,而《尔雅》曰:‘豈弟,發也。’‘薄言观者’,毛公无训。‘振古如兹’,毛公云:‘振,自也。’康成则以‘观’为‘多’,以‘振’为‘古’。其说皆本于《尔雅》,使《尔雅》成书在毛公之前,顾得为异哉?”则其书在毛亨以后(案:《诗传》乃毛亨作,非毛萇作,语详《诗正义》条下)。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观《释地》有“鷩鷩”,《释鸟》又有“鷩鷩”,同文复出,知非纂自一手也。^{[8]338}

四库馆臣考订《尔雅》成书时所用的资料都是各种注本,例如犍为文学《尔雅注》、郭璞《尔雅注》、邢昺《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以及记载其与毛传关系的曹粹中《放斋诗说》,然后确定了大致时间段为毛亨之后,汉武帝之前,最后认定“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词”。现代学者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1984)的观点与《总目》有相同之处,他们归纳了历史上几种有代表性说法:一说为周公所著,成书在西周;一说为孔子或其门徒所著,成书在东周;一说为汉儒所著,然后认为上述几种观点都不够准确,主张《尔雅》不是某一人某一时之作,而是博采众多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且汇编也是逐步完善。初具规模的时间大约在战国时期,即公元前400—300年左右。^{[9]113}

三、文字章节

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有附益现象,有的存在于篇章之中,有的附益于书末篇末。《总目》在介绍著作内容,评判学术价值时,注意考察著作内容前后一致性和鉴别文字章节的附益伪托。根据提要所涉及的鉴定细节,文字附益情形可分为两类:后人续作和移掇添补。

(一)后人续作

作伪者在原著基础上,在末尾,或者其他位置添加部分章节,企图在某种程度弥补原著的不足,并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自己的观点随着原著流传能影响深远。但由于原著和后人续作章节毕竟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详细分辨就能发现前后内容不一致,观点不能相互照应等缺陷,从而鉴别附益文字的伪托。例如《字通》提要:

其前题词有“《复古编》、《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云云,似非从周之语。又虎字类虚字条下既称“今别作墟,非是”,而此又出“虚作墟,非”一条,指为《字通》所未及。使出从周,不应抵牾如此,其或后人所窜入歟?^{[10]351}

《字通》实际分为上、下两卷,在结尾处有这么一段话“总八十九部,六百又一文,盖字书之大略也。其他则张谦中《复古编》最为精详矣,或有字本如此而转借他用,乃别为新字以行于世,《复古编》及《字通》尚未及之,略具如左文”^{[11]91},承上启下,既总结了前面两卷内容,又说明下面所讲的是“因文字假借而另造新字”的现象。四库馆臣抓住了《字通》最后这部分文字与前面上、下两卷内容之间的矛盾:前后语气不能贯通,内容重复,由此怀疑这段文字不是作者李从周的手笔,而是后人续作。

又如《字彙》提要,四库馆臣甄别出《字彙》有两部分文字是后续的,一是《篆体辨诀》,一是于末尾处所增加的一百二十四句,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认为《篆体辨诀》“其区别形体,亦颇有资于六书”;而“惟其末比旧本增多一百二十四句,则纰缪杜撰,不一而足”“盖无识者所窜入,不足依据”。^{[10]355}

(二)移掇添补

移掇添补是指原著在后来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由于编者缺乏相应的知识,或者贪多求广,将原本不属于原著的内容,生拉硬拽,将之移植过来的现象。这会造成两者难以融合,破坏著作的整体性。例如《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提要:

一本为康熙丙戌曹寅所刻,冠以余文靖所作欧阳德隆《押韵释疑序》一篇、郭守正《重修序》一篇、《重修条例》十则、《淳熙文书式》一道。考守正所重修者,名《紫云韵》,今尚有传本,已别著录,则此本非守正书。又守正《条例》称德隆注“病痿其捌之辨,似失之拘”,今此本无此注,则亦非德隆书。观守

正《序》称“书肆板行,漫者凡几,一漫则一新,必增数注释,易一标题”,然则当日《韵略》非一本,此不知谁氏所刻,而仍冠以旧序及条例,其条例与书不相应。而《淳熙文书式》中乃有理宗御名,是则移掇添补之明证也。^{[12]360}

据考证,《总目》所提到的曹寅所刻,即康熙四十五年曹寅在扬州使院任上所刻,其底本即为棟亭本,棟亭本平声淳韵不收与理宗御名同音的匀小韵,而《淳熙文书式》却有理宗御名,不避讳,这是四库馆臣鉴定其为“移掇添补之明证”;另外就是书前所列的序言和凡例,与正文不相应。总此,四库馆臣认为曹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前面的序、条例和文书式都是编印者不了解实情,将它们从别的版本移植过来的。

考辨古籍真伪应该以著者、成书年代和附益文字章节为对象和范围,辨明作者是首要工作。作者未明,则讨论该书的完成时代。至于文字章节的附益伪托,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编纂《四库全书》涉及典籍众多,对许多著作的真伪,历代争论不断,难有定论。四库馆臣在整理这些名著时,积极展开考辨真伪工作,并将自己的辨伪过程记录下来变成文字,写入《总目》,以此作为对学术界所探讨的热点问题的回应(例如《尔雅》成书时间、《方言》作者等),他们的观点也已经成为后来研究相关问题的重要参考,他们的辨伪实践也将为古籍鉴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参考文献:

[1] 永瑢,等. 卷首[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永瑢,等. 类篇[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3] 永瑢,等. 集韵[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4] 永瑢,等. 崔氏小尔雅[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5] 永瑢,等. 篇海类编[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6] 永瑢,等. 五侯鲭字海[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永瑢,等. 小尔雅[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永瑢,等. 尔雅注疏[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杨伯峻. 经书浅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 永瑢,等. 字通[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1] 李从周. 字通[M]//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12] 永瑢,等. 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M]//四库全书总目. 北京:中华书局,1965.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and the Discrimination of Ancient Books

LI Jianqing
(School of Chinese,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f distinguishing forgeries, the officials of Siku librar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distinguishing forgeries of ancient books. The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uthenticity of ancient books in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the age of the book, and the chapters and chapters, which examines the author's authenticity, the accuracy of time of the book written, an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ancient books.

Key words: *General Catalogue of Siku Quanshu*; discrimination; edition